

在苦难中重申对人类的爱

□石琢玉



「俄陀思妥耶夫斯基」
《狱中家书》
上海人民出版社
2024年1月

1849年4月,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,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,同年12月被判处死刑,临刑时改判为四年苦役,然后充军。他给哥哥和弟弟写的信描绘了在狱中的生活,特别是最后一封,书写了他处在死亡边缘时的心理状态,这些书信记录了他对人类心灵极限的最初探测。即使身处最为严酷的绝境,他也没有失去写作的强大意志,几乎是凭借写作支撑着全部的生存。

小说之外,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。和他的小说一样,在散文里,“陀思妥耶夫斯基”呈现为不可替代的精神现象。它们不仅是理解这位文学巨匠的钥匙,也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生活和意识的许多根本特征。

《狱中家书》精选了这些书信和随笔。其中,《彼得堡纪事》《狱中家书》两篇集中提供了相对典型的陀氏文学世界观。《彼得堡纪事》中,通过再现彼得改革后处于时代剧烈变动中的俄国现状、复杂细微的人间百态,凸显出一种病态的、奇怪而阴郁,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彼得堡都市形象,在这种城市力量的整合下,所有阶层的人民得以“开始”生活。陀氏零散、离散的叙述中始终维系着不变的主线——都市人民,生动而深刻地追踪着于时代激烈碰撞间,那些掩盖在表象下的人们时代心理症候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,“可是研究城市却是并非无益的事”。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,审视并阅读城市的历史,亦是文化建筑中读取、了解整个时代,作者敏锐地

把握住了疾驰生活背景下当代思想的困顿与迷惘。人们被讲述、被描写,有时也在世人面前分析自己,常常是怀着痛苦的心情。陀氏饱含着对人民的同情,注视人们复杂变幻的心理世界,以巨大热情谈及美德、创造、当代思想,强调生命本身不受苦难摧毁的美丽内核——即使是在病态的时代(“我们这个时代,生活平庸贫乏,萎靡不振,因此人们力图用幻想及其一切辅助手段来填补他的空虚”)。透过富含意象的塑造,“幻想家”这一极具特点的形象和概念在本文被提及,不久后也成为他创作全新小说人物的灵感原型。我们能够看出,正是这样对万事万物充满探究心、不断叩问内心灵魂并将其付诸笔墨的坚持,才能使得一部部伟大作品于灵感迸发的一瞬间被捕获、凝固于纸面,最终得以成型。

《狱中家书》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个生活困顿、深受苦刑折磨,却仍用文字传达不受禁锢的饱满情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。相较于其他随笔中透析人间的求索者、政论文中用语夸张怪诞却直击重大问题的思想家,他在这篇里,更像是一位挣扎于穷困、向往着美好生活、与千千万万受压迫的人民有着同样美好不屈灵魂的普通人。遭到牢狱之灾,不知审判和死亡何时到来,在如此极端恶劣的处境中,他渴望并重视着亲情,将书籍与思想融入血肉。尽管死亡与刑罚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,他仍旧顽强地与病魔斗争,化生命为文学信念,在绝境中寻找他眼中的“救赎”。

1849年9月14日的信中,他写道,“也就是说,我靠着脑袋而生,别无其他”——这一天是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日子,他以为自己即将被处死,被拉去行刑前的最后一分钟里,他饱含对亲人的爱,想念着他们。经历临刑前获赦免的劫后余生,他又写道,“生活就在我们自身,而不在外界……如今,我的生活变了,我要以另一种形式再生”。

这些家书也可窥见陀氏文学观念的一斑,他详尽描述了自己苦役期间严酷的生活条件与病魔的侵扰,这一切身感受也使得他将人民的热爱与理解融进写作中,他脑海中无数的形象都是血肉鲜活的人民苦难的缩影。陀氏眼中的文学写作也是摧毁与再造生命的轮回历程,在不断写

作中,这些灵魂将获得生命的载体,变得愈加完整,就如文中说的,“有多少个形象受过重伤之后活了下来,经过我重新创造之后,又要死去,在我的头脑中消失,或者变成毒汁融入血液里!可是假如不准写作,我就宁肯死去……只要是手里能握着笔,那也是好的”。《百岁老妇》一篇就是这样一篇写作背后的故事,一段见闻、一些不连贯的印象,却能霎时间勾起作家的灵感,转化成为文学世界里的一个小小场景,对生死的体悟、对人民深刻的爱使得故事丰满而连贯。

本书的其他几篇,或回忆、或特写、或对话,打破了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风格固有的印象,其内容分别以乔治·桑、女性运动、民族历史、人口与土地问题、普希金的文学地位等话题,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陀氏的文学、政治、人类观念。不仅仅局限于文学,陀氏也广泛地探讨了女性力量、城市体制扩张与土地不合理分配所埋下的隐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,比如《在矿区什么东西最有价值?》等多篇文章采用对话体,借“奇谈怪论者”的对话这一怪诞夸张的形式,揭露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,重申应对人类抱有的热爱。

尽管陀氏因其所处时代的桎梏,其思想仍带有一些理性化、宗教化的色彩,但其始终有着对精神世界执着的探索与思辨。他坚信俄国人的使命是全欧洲性和全世界性的,并在文学界发出呼吁,以朴素的目标要求实现最迫切的大联合以及全人类的统一。通过对普希金文学精神的欣赏,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蕴含着反映全世界的能力——天才的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,超越时代窥见了这种“世界性”实现的可能。

对文学、对世界包含痛苦与爱的思索,是从陀氏充满诗性与情感的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。回观今日,陀氏之书仍然以其复杂而真切的思想,给予我们这个同样充满时代症候性的社会以超越表象、直击灵魂的启示。在如今这个媒介信息空前爆炸的电子时代,我们处于一个似乎冷漠的离散化、原子化社会中,重读百年前陀氏的文学,汲取其带给我们的超越时空的思考,找回我们弥散在电子空间中的主体性,将人与人之间脆弱、断裂的关系,通过炽热的文字重新维系在一起。

感受友谊的力量

□刘学正



《达尔文与胡克》
[英]亚力山德拉·斯图尔特
[英]乔·托德-斯坦顿
山东人民出版社
2023年10月

150多年前,达尔文出版《物种起源》,用“进化论”揭示生命演变的奥秘。英国童书作家亚力山德拉·斯图尔特的《达尔文与胡克》一书,从达尔文与挚友胡克的相识相知入手,梳理他们投身科学的主要成就、关键转折,赞扬他们建立的深厚友谊,而这也凸显出《物种起源》探寻生物多样性之源、万物进化之美的温暖底色。

达尔文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,生性活泼的他从小就热衷于收集物件和观察大自然,父亲支持他的兴趣,“送了他最初的两本博物学书;一本是关于石头、化石和矿物的,另一本是关于昆虫的。”大学期间,达尔文取得了他的首次科学发现——在显微镜下观察微小的苔藓虫如何繁殖,坚定了终生从事科学发现的决心。后来,他周游世界,考察了很多遥远和危险的地方,收获了大量不同寻常的标本。他逐步认识到,所有的现代生物都是从一个简单的生物类型缓慢发展或演变来的,他将这一开创性的理论称作“自然选择的进化论”。

然而,如果不是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,达尔文或许根本就不能取得这一成就。其中,没有人比该书的另一主角——胡克的贡献更大。胡克是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、伦敦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园长,他到世界各地去采集植物标本,以了解植物为什么会生长在各自的产地,并将自己的专长与思考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达尔文。更重要的是,胡克是勇敢又忠实的朋友,他一直聆听、质疑并最终捍卫了达尔文具有革命性的想法。

真正的友谊,在于彼此信任。书中提到,在神学大行其道的社会背景下,当达尔文意识到自己发现了“离经叛道”的新理论后,给胡克写了一封绝密信,将其作为第一个倾听者。尽管胡克对“物种可变”还没有深信不疑,但他表示很想进一步了解达尔文的理论。胡克的回信,让达尔文如释重负,感到暖暖的宽慰涌入心田。而《物种起源》出版一个月后,胡克成为首位撰文支持达尔文理论的科学家。在一场辩论中,面对咄咄逼人的牛津卫道士教,胡克以犀利凝练的言辞,勇敢捍卫达尔文理论,赢得了阵阵掌声。达尔文后来承认,当他得知挚友在辩论会上的表现时,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

翻阅《达尔文与胡克》,不但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光辉,还可以接触到贯穿于字里行间、细腻图画中的大量知识,譬如植物学、生物学以及地理、文化、历史等。一个个知识点,虽然只是浅尝辄止,却为孩子推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。

该书恰如其副标题所示,是一本“给孩子的《物种起源》诞生记”。达尔文与胡克激动人心的探险、孜孜不倦的探究、毫不动摇的信念,以及载入史册的友谊佳话,将激发孩子们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,勇攀科学的高峰。

先醒者的孤独求败

□禾刀



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
《走向世界的挫折》
汪荣祖
岳麓书社 2023年7月

海的一路见闻却让郭大开眼界:洋人不仅有坚船利炮,大都还彬彬有礼,十分注重卫生,街区宽大整洁,住宅“雄伟不失温馨”……这与士大夫传统意识中的邪恶夷族形象有着颠覆性区别。接触越多,郭越笃信“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”。

1876年,肩负赴英“通好谢罪”的郭嵩焘意外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。此前他没有接受任何外交训练,也没有经验可循。不过,面对士大夫的口诛笔伐,郭嵩焘没有气馁,反倒充分把握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,将旅途见闻以日记形式汇聚成《使西纪程》。毫不意外,这些充满对先进文明溢美之词的文字,再度成为顽固士大夫阶层发起新一轮围殴运动的又一“铁证”。

郭嵩焘的许多见解太超前太激进,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唤醒那些素来以天朝自居的愚昧士大夫,即便是思想相对开化的洋务派似乎亦难完全认同。不过,汪荣祖认为郭氏过于直率与固执的性格,助长了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矛盾。

传统士大夫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,骨子里无法接受郭嵩焘这样他人志气的“崇洋媚外”思想。相较于传统士大夫的顽固不化,洋务派似乎更能看到西方文明之长,但依然跳不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意识桎梏。郭氏一针见血地指出,洋务派“仅能考求富强之术,如枪炮船械之类,而昧于本源”。1872年至1875年,洋务派曾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远渡重洋赴美求学。终因无法突破守旧思维枷锁,幼童求学之旅半途夭折。尽管如此,这批幼童回国后仍旧成就斐然,诞生了国务总理1

人、铁路局长3人、外交部长2人、铁路官员5人、公使2人、铁路专家6人、外交官12人、矿冶专家9人、海军元帅2人、海軍军官14人……成就纵然可喜,而求学活动未能坚持则让人唏嘘。

在汪荣祖看来,郭嵩焘所谓的争议性主要表现在,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先醒者,一旦认定,便义无反顾。所以他能开国人之先河,看清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长处后,哪怕只是一己之力,也要努力从衣食、社交等方面付诸实际行动,极力融入西方社会,试图找到中国出路。

不过,郭嵩焘越是努力,越显孤独,汪荣祖称其是“寂寞的引路人”。作为晚清士大夫中的先醒者,郭的这种觉醒远超同时代那些倡导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“洋为中国”的洋务派。当然他也有局限性,他不同于左宗棠和曾国藩,他的见识更多局限于理论层面,或者说他看得远,洞清时代潮流方向,但在将超前见识转化为可行性行动方面,又似乎缺乏足够的智慧。

1891年,郭嵩焘走完了人生旅程。他的那些先见之明,虽然没能得到同时代的认同,但却像种子一样,在华夏大地播撒并悄悄孕育。在他赴英四十多年后,虽然国力依然羸弱,但一位熟读国际法律知识、英姿勃发的年轻人——顾维钧站在了巴黎和会的舞台上,按照西方思维慷慨陈词,大放异彩。顾维钧是中国第一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素养的外交官,这也是他外交生涯职业成就的关键所在。郭嵩焘当年虽然受挫失败,但他极力倡导的外交理念,终于生根发芽。

1856年,郭嵩焘借道上海前往浙江筹集粮饷。这是一次意料之中的顺道,但上